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文明意涵^{*}

罗 健

【内容提要】 和平发展的中国道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丰富的文明意涵。这一发展模式摒弃了西方历史上殖民扩张和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自我优先”的发展逻辑，打破了对西方现代化“单一路径”的固化认知，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了人类文明成果、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展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之路、维护平等相处的和平环境、坚守善于斗争的和平法则、推动包容互鉴的和平交往、确立共同发展的和平愿景，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和平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明意涵 实践路径

作者简介：罗健（1974—），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合肥 23000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① 这一重要论断蕴含着深厚的文明意蕴和时代价值。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和”文化为基石，开创了一条不依靠殖民扩张和掠夺，而通过和平发展、依靠内生动力实现文明跃升的发展新路。从理论维度看，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原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价值；从实践维度看，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文明活力，展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文明担当，对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②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传承与文明发展道路。“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化自主性发展的中国理念与实践路向研究”（24AKS017）、合肥工业大学202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页。

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①。中国“和”文化为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1. 秉承中华文明的生存理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天人合一”理念强调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相互协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纵观中国哲学发展史，儒、释、道等各家学说在探索万物和谐共生方面有着共同的旨归，而“天人合一”正是这一思想脉络的集中体现。在农耕文明的长期实践中，“天人合一”理念获得了深厚的现实根基。古代农人通过观测天象，把握气候变迁，顺应四时更迭，将生产活动与自然规律完美契合，形成了对生命与自然环境之间共生关系的深刻认知。这种朴素的生态智慧，促使先民不断探索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在应对生存挑战的同时，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路径。历经世代传承，“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生活哲学之中，铸就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天人合一”不仅是古代中国“以德配天”治国理念的文化基石，也是中华文明和平性在人与自然关系准则上的具体体现^②。“天人合一”精神的主旨在于天文与人文是相通的、统一的，其带给我们的思想启示是：社会文明进步不仅是物质的积累，也是对和谐关系的建构，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皆需以“合一”之心走向共生共荣。在当代语境下，“天人合一”提供了一种非对抗性的思维模式，为推动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作为“义理之天”，“天人合一”演变为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伦理要求，在自然维度上体现的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社会维度上体现的是维系人际关系的和睦有序，在国际维度上体现的是倡导和平共处的交往准则。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与发展了传统“天人合一”观念，展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2. 秉持中华文明的处世之道：“协和万邦”的国际观

《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治国智慧。中华先民在看待天下邦国时，能够超越政权、体制、地域的限制，主张通过和平协商化解矛盾，期望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协和万邦”的目的是使“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儒效》），达到“天下大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美好世界的憧憬。如《诗经·硕鼠》抒发了对“乐土”“乐国”“乐郊”的热切向往，《尚书·大禹谟》提出了“万邦咸宁”的理想目标，《周易·咸卦》则表达了对“天下和平”的美好期盼。《礼记·礼运》借孔子之口全面系统阐述了大同观，倡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核心理念为“和”，强调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回答了建立什么样的“天下”的问题。“和”的思想精髓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构筑了“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理念的哲学基础。

“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协和万邦”理念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迥异的价值取向。这一东方智慧强调，国家长治久安不应建立在武力征服或霸权扩张之上，而应通过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来实现。2018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欢迎宴会上指出：“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③“协和万邦”在当今时代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内涵，即以“和合”文化为纽带，通过互信互谅实现国家间的和谐共处；以“共生”哲学为导向，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以“大同”理想

①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16 日。
② 参见王岩：《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基于中华文明和平性多重样态的视域》，《求索》2024 年第 2 期。
③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10 日。

为追求，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平安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中国式现代化将“协和万邦”理念创造性转化为新时代国际关系准则：在理论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方法上坚持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精髓，为破解当今世界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提供了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华文明对人类进步事业的独特贡献。

3. 展现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和而不同”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命题，源出《论语·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经典论述。这一思想以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深刻揭示了差异共存的价值真谛。孔子通过“和”与“同”的哲学辨析，不仅确立了君子人格的价值标准，更彰显了儒家“尚和不尚同”的伦理追求，体现了中华文明“致中和”的深层智慧。“和而不同”思想植根于中国哲学“和实生物”的本体论认知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传统，构建了一个包含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社会理想等多维度的价值体系，其精髓在于实现自主性与包容性的辩证统一：既秉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共生理念，又践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①的和谐智慧。这种独特的文化品格，历经千年积淀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绵延数千年，确立了亦此亦彼的和谐共存思想，强调国家之间虽然有差异性，但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交往。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一传统智慧创造性转化为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②，主张各国政党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应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中国积极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在国际关系格局上主张“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③。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和而不同”以新的时代内涵，探索出一条尊重差异、包容互鉴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4. 凸显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人心和善”是一种与人的存在和发展融为一体的道德要求，表现为谦和有礼、和颜悦色以及宽容待人的行为模式。其主张人在面对问题、处理矛盾时，以和善为准则来规范行为。孟子认为，“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对民族与国家的繁荣稳定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人心和善”倡导的不仅是一种平和善良、友善待人的心态，更是谦和礼让、宽容大度的行为体现，其核心在于追求以仁爱为基础的和合价值理念。这种伦理精神强调身心和谐、知行合一，并着重于心性的培养，既体现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倡导的对待他人与社会的态度。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人心和善的民族。“人心和善”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影响民众行为和国家政策的重要准则。在“人心和善”价值观的长期熏陶下，崇尚邻里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成为中国人民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形塑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性格底色。秉持“人心和善”的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旨在增进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不断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与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决不走扩张、称霸的道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与分歧，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和善心性的追求以及对国际责任的道义担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和谐共生、与人为善、和平相处等“和”文化的思想精髓，赋予中国式

① 费宗惠、张荣华编：《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5页。

③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08页。

现代化深邃的处世智慧。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为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道德支撑和道义力量，彰显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自信与文明追求。

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局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局限性，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求解“中国之问”“现代化之问”，走出了一条不通过对外殖民掠夺、对内残酷剥削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局限，深刻改变了世界现代化格局，为人类探索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新的选择。

1. 摒弃了西方历史上扩张和掠夺的现代化模式

西方现代化在历史上走的是对内剥削、对外殖民的道路。马克思曾以“海盗式的英中战争”^② 这一鲜明表述谴责英国对华的侵略行径，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以“文明战争”为幌子进行殖民扩张的虚伪本质。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深刻批判揭示了其内在矛盾与历史局限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③ 这一论断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外表下的反文明本质，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制度根源，暴力手段往往成为资产阶级追逐一己私利的重要选择。“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④，“对他们来说战争与和平同样是有利的”^⑤。资产阶级通过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等暴力手段完成原始积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⑥。依靠殖民统治和资源掠夺而实现的西方现代化，实质上是一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仅限制甚至阻碍了其他国家的发展，还导致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

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和平性的内在特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占有，不存在发生战争的经济基础。恩格斯指出，“我们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⑦。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战争的和平性的社会。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必然反映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规定，在现实中彰显出对和平发展的维护和引领人类美好未来的价值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⑧ 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从未主动向任何国家发起侵略、掠夺和战争，而且中国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坚持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

①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6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08页。

⑧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迫、以共赢代替零和，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

2. 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自我优先”的发展逻辑

西方现代化奉行霸权主义。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构建的霸权体系具有鲜明的自我中心主义特征，其试图通过零和博弈的竞争思维构筑起全球支配体系。资本主义实现工业现代化以后，通过制度化的霸权体系持续压制后发国家的发展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这种文明输出实质上构建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形成了西方现代化“自我优先”的霸权体系。西方现代化坚持“自我优先”的霸权逻辑，在实践中构筑并维系全球“中心—边缘”结构，试图以这一不平等的秩序体系压制和阻碍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一，西方现代化的“自我优先”表现为在国际秩序中无视发展中国家利益、排斥甚至否定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可能。西方国家将自身文明塑造成“普世文明”的标杆，通过全球经济分工、国际制度设计和知识话语体系，系统性否定非西方文明具备现代性的可能。西方现代化“向全球灌输‘西方优先’的逆全球化和单一现代化观念，并通过设置重重障碍使发展中国家沦为西方现代化体系的‘依附者’或现代化的‘无望者’”^②。其二，西方现代化的“自我优先”还表现为西方社会内部个别国家的“强国优先”。在这方面，美国长期奉行的本国利益至上的“利己主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时至今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本应承担的大国责任而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构建起以零和博弈为核心的竞争体系。美国通过对新兴经济体实施技术封锁和市场遏制，持续维护其垄断地位。当今的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通过加征关税、经济制裁和贸易协议重新谈判等手段，对盟友和对手进行经济胁迫，试图巩固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暴露出“美国霸权”的本来面目。

中国坚定倡导和平发展，走出了西方“国强必霸”的传统发展模式窠臼，开创性地摆脱了西方现代性困境，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型文明范式。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各国命运紧密相连，“国强必霸”的西方大国崛起思维定式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定。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繁荣昌盛是趋势所在，但国强必霸不是历史定律。”^③与西方穷兵黩武式的崛起道路不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彰显了中国自觉肩负全球责任的大国担当，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自我优先”的发展逻辑。

3. 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单一路径”的固化认知

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被错误地奉为人类现代化的“唯一范式”和“普世标准”。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和交通技术革新，推动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④，但这种世界性交往始终受制于资本逻辑的支配，形成了不平等的文明秩序。恩格斯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⑤。虽然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

② 刘志刚：《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逻辑起点、模式选择与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③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

资本主义将技术优势异化为构建“文明等级制”的工具，通过将自身经验绝对化，制造出“单一文明进化论”的意识形态神话。按照西方中心论的叙事，和平发展几无可能，西方列强创造的历史就是他们所谓的世界历史经验。“赢者通吃”“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长期支配着西方人的头脑。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一定会遵循西方现代化对抗性、排他性的发展模式，无法实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因此，西方人质疑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炮制种种中国搞霸权、“新殖民”的所谓“证据”。这是典型的把中国等同于西方列强，把中国式现代化等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固化思维，实质上遮蔽了各国、各地区基于自身传统，实现现代化的多元可能。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基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必然导致单一路径的现代化。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① 不同文明作为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产物，在知识体系、价值伦理与制度创新等方面各具特色和优势。西方现代化是基于西方历史文化的一种现代化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早有洞见：“直到现在每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具有某种优点。”^②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文明的底蕴来实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而不是走与文明发展相背离的西方现代化“对外扩张”的老路。2023 年 8 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的讲话中强调：“文明多姿多彩、发展道路多元多样，这是世界应有的样子。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一种文明、一种制度。”^③ 各国文明发展具有自己的特征和优势，任何文明都不应凭借自身优势压制其他文明的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彰显了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自主性、多样性，表明现代化可以不依附任何国家而独立自主地发展。西方现代化的扩张之路具有不可持续性，违背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总体趋势，必须坚决予以摒弃。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照搬西方现代化路径，更没有“去传统化”，而是立足本国实际，继承与发展了传统文化的“和平”因子，批判了“现代与传统”相对立的伪命题，打破了现代化等于殖民扩张的魔咒。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生动诠释了各国通过和平发展方式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既避免了成为先发国家附庸的命运，又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

三、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要求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既超越了“国强必霸”的历史窠臼，又重构了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坐标，彰显了东方文明古国守正创新的治国智慧与和合共生的文明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④ 这一现代化道路传承了中华文明“以和为贵”的优良传统，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要求，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传承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

西方现代化范式虽在特定历史阶段推动了技术革命与制度创新，但其殖民扩张的本质特征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单向度输出，形成了“中心—边缘”的文明等级结构。这种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构成了对异质文明系统的结构性压迫，造成了全球文明的生态失衡。从哲学维度审视，人类文明本质上是多元共生的价值体系，不同文明形态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根本上是人类应对生存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36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54 页。
③ 习近平：《团结协作谋发展 勇于担当促和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8 月 24 日。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241 页。

挑战、实现社会进步的智慧结晶。

历史经验表明，战争是摧毁人类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严重的破坏性力量。“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陷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① 特别是帝国主义发动的非正义战争是对文明的袭击和摧残。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指出，战争“使物质财富遭到巨大破坏，使生产力消耗殆尽，使军事工业蓬勃发展，以致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无法进行。因此，这次战争使人类陷入了绝境，使人类濒于毁灭”^②。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会完全破坏现代文明和文化的成就，而且也必然会摧毁人类社会存在的条件”^③。唯有在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才能有效守护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遗产，切实保障生产力发展和多元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传承构筑坚实的“防护屏障”。

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对新型文明对话机制的前瞻性探索，既坚决抵制新殖民主义式的“单一文明霸权”，又坚定主张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护文明多样性，通过文明的交流互鉴实现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传承。“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④“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⑤ 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世界交往最终将实现真正的普遍交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的解放。因此，世界交往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在和平发展的广阔天地中实现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融合发展。正是在文明的广泛交流和相互借鉴过程中，不同文明择善而从、兼收并蓄，进而实现文明的传承、丰富和发展。这样反过来也利于消除“文明冲突”，实现人类文明间的和谐。中国式现代化既尊重各国文明的独特性与内在价值，又有效化解文明冲突的潜在风险，致力于构建多元共生的全球文明新形态。这种文明新形态使得人类能够持续推动文明的传承创新，为世界文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让人们更好地共享人类创造的文明硕果。

2. 彰显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

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文明的具体呈现。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⑥。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状况是衡量文明发展的重要尺度。文明是具体的、现实的。文明的价值是“现实的个人”在实践中赋予的。离开“现实的个人”的文明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文明，撇开具体的人去空谈文明也是毫无意义的。“文明是属人的事情，文明程度直接取决于人的发展程度。”^⑦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将人民立场贯穿于整个文明发展过程之中。资本主义文明遵循丛林法则，奉行强权逻辑，充满暴力和不公，伴随着侵略、殖民等不义之举，其内在的矛盾局限性注定了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文明“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⑧。文明的发展最终体现为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在现代文明中推动人的发展，一个基本的现实前提是依靠和平环境来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⑦ 张三元：《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现代化》，《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8期。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和平发展，坚持以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不断促进人的发展，实现了从“物本”向“人本”文明理念的转变，标志着人类文明的重大跃升。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了系统性保障体系。首先，和平发展是经济繁荣发展的前提条件，可以形成“发展—保障—再发展”的增强路径，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确保教育、医疗、文化等发展资源的可获得性。其次，和平发展有利于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在制度层面为个体发展提供平等、自由空间，促进人际交往与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最后，和平发展是开放包容的基石，在文化层面为人的发展提供全球视野与交流空间，培育人的思想自由、创新活力与包容心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①。总之，和平发展通过消除冲突威胁、构建社会福利体系、拓展发展机会等途径，为个体在智力、体力、道德、创造力等维度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当然，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也有助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治理优化，从而推动和平发展向更高层次演进。

3. 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

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②。这一经典论断不仅揭示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性，更深刻阐明了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辩证法。资本主义文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但在促进人的发展的意义上，资本主义文明本身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无产阶级的文明使命在于实现共产主义，以解答“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③这一历史命题。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其本质规定性在于超越地域性文明的局限，以“世界历史性”的文明形态实现人类真正的共同体。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更高社会形态的到来创造条件，是通往最终“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经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平发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④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精神内核，强调以和平发展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系统回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从价值维度看，和平发展理念强调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意识形态藩篱，避免价值观输出引发的文明冲突。从实践维度看，和平发展为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保障支撑：其一，作为思维方式，通过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范式；其二，作为经济纽带，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缩小发展差距，力图避免经济冲突；其三，作为安全底线，通过构建生命共同体应对生态危机、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这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筑牢人类利益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的基础上构建保障人类整体尊严的文明共同体，其核心特征体现为：从权力中心文明向责任共担文明转型，从对抗性博弈向包容性发展转变，从单一现代性向多元现代性演进。这一转型过程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发展，也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提供了中国方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④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践路径

“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①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之路、维护平等相处的和平环境、坚守善于斗争的和平法则、推动包容互鉴的和平交往、确立共同发展的和平愿景，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实践路径。

1. 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之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个民族或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关系到该国的前途和命运，必须由这个民族或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②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的、与历史上许多大国崛起方式迥然相异的和平发展之路。

西方强国习惯于依靠战争和殖民不断扩大自身在世界的利益和势力，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质和价值取向，决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殖民扩张之路。中国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中国的文化中蕴含着“和平性”，因此，他国崛起的非和平方式并不适合于中国。中国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寻求的是一条在维护和平的基础上谋求发展、以自己的发展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兼具科学与道义的文明之路。

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是立足于自己力量的发展之路。独立自主的价值准则，就是坚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强大自己，进而坚决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在现代化的奋斗历程中，我们一贯坚持独立自主。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且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等一系列伟大成就。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③，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坚持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着力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之路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安宁与福祉，在努力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推进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文明繁荣过程中作出了独特贡献。

2. 维护平等相处的和平环境：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保障

文明多样性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也会创造不同的文明。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④ 只有不同文明平等相处、和谐共生，才能打破交往壁垒，推动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历史表明，文明间的隔阂主要不是地理距离造成的，而是缘于认知上的偏见与误解。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差异是常态，关键在于能否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这些差异。马克思严厉批判

① 习近平：《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人民日报》2015年5月8日。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13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68页。

了西方侵略者把所谓“文明”强加于别国的行径。在马克思看来，近代以来的西方殖民侵略毫无进步可言。他指出，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①。只有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各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

平等相处是对待不同文明的应有态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精辟地指出，财富的增长产生了掠夺战争的可能^②。这一论断揭示了暴力冲突的物质根源，也让人们深刻反思战争的本质和影响，寻求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之路。真正可持续的和平发展必须建立在不同文明对彼此生产生活方式相互承认的基础之上，这正是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处的物质前提。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别，每一种文明都是平等的存在，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③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任何一种文明想要以暴力手段代替或置换其他文明，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摒弃“文明等级论”的霸权思维，否定任何文明的中心地位，倡导各国尊重彼此的文化和制度，尊重各国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阵营对抗，倡导文明多元共生，主张各文明平等对话。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创设相互尊重、平等相处的和平环境，根本目的是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3. 坚守善于斗争的和平法则：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践遵循

矛盾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社会在矛盾运动中前进，有矛盾就会有斗争。矛盾斗争的形式由事物矛盾的性质和矛盾运动的具体条件所决定。斗争既可能采取对抗的形式，也可能采取非对抗的形式。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源于哲学上的矛盾斗争性，斗争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在斗争中成长、壮大的，斗争精神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和平不是依靠妥协得来的。和平与斗争是一对矛盾关系。马克思强调：“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④ 要保持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前进，就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斗争，防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只有通过斗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毛泽东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⑤。和平与斗争是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和平不是靠乞求能得来的，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和遏制霸权主义的企图。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能守护和平发展的底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决不干称王称霸的事，决不会搞侵略扩张，但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能决战决胜……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⑥

坚持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艰巨而伟大的社会革命。近年来，随着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泛起，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地缘博弈色彩加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面对全球不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79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96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42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70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745 页。

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93 页。

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日益突出，特别是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等诸种对立行为，我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强化担当作为，提高斗争本领。中国人民发扬斗争精神，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塑造了有利于民族复兴的良好外部环境，又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世界人民一起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4. 推动包容互鉴的和平交往：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生成

现代性语境下的文明发展规律表明，开放性与包容性是文明存续的核心要件。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审视，文明交流互鉴在本质上是人类从“地域性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转变的文化表征。文明形态的存续发展必须依托开放包容的文明观，通过交流互鉴实现文明因子的创新性重组。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①任何文明若长期故步自封，必然导致文化僵化、社会停滞和科技落后，最终难逃衰落的命运。

和平发展与文明交流互鉴统一于历史发展进程。从历史的视野来看，“战争在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可以加快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和融合，但这种文明交往与融合的方式是暴力的、血腥的，是不可取的”^②。全球和平发展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安全基础、创造稳定环境，而各国的文明交流互鉴也有利于消解对抗逻辑、促进共同利益、构建共享价值。一方面，和平发展基于共同利益的交往理性，解构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固有的“文明冲突”对抗逻辑，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之开放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文明交流互鉴有利于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包容，培育积极的价值共识，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生态，反过来又促进全球的和平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观以创新思维超越了传统的冲突对抗范式，构建了开放合作的文明交流平台。历史表明，文明对抗只会阻碍人类共同进步。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③。文明交流互鉴既克服资本逻辑对文化多样性的侵蚀，又保存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极内容；既有利于促进文化、科技与思想的深度交融，又有利于培育各国人民之间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中国始终秉持“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通过和平发展促进文明互鉴，以文明互鉴深化和平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文明发展新格局。

5. 确立共同发展的和平愿景：人类文明发展的现实目标

和平与发展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④人类文明发展史呈现出竞争与协作的辩证统一。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人民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共同发展破解风险挑战。“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⑤。共同发展理念之所以能够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魔咒，关键在于其深刻把握了全球各国利益交融、命运与共的客观现实。唯有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以共同发展为纽带，才能打破“安全困境”，实现文明间的互鉴共荣，进而促进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29页。

② 戴圣鹏：《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67页。

③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34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48页。

⑤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61页。

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① 和平发展是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动诠释，是完善全球治理的基石，是各国共同发展的理性抉择。共同发展是和平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共同发展已从国家战略上升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共识，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协同进步。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发展不仅为国际关系注入确定性，更通过构建利益交融的发展格局，为和平发展奠定坚实的价值共识和物质基础。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把对和平发展的维护融于现代化发展战略之中，转化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具体实践。和平发展的中国道路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新动能。

结 语

真正的文明必须以和平为旨归。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勇于直面资本主义文明悖论与症结，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面超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② 和平发展的中国道路不仅通过自身实践树立了典范，还提供了宝贵的价值导向，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全球历史视角、世界情怀及大国担当。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在高远宏阔的文明视域中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使命、未来远景及其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是顺应人类文明演进趋势的历史必然，彰显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崇高追求。

参考文献：

- [1] 项久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
- [2] 刘同舫：《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浙江学刊》2024 年第 2 期。
- [3] 黄建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0 期。
- [4] 吴志成：《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 年第 10 期。
- [5] 李冉、郭小凡：《何以必然 何以可能：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1 期。

（编辑：夏一璞）

①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259 页。

②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 1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118 页。